



「大器晚成」早已不是新鮮話題，筆者之所以要在這週老調重彈，是因為讀了一篇《紐約客》作家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的「答讀者問」。

有讀者問：「一個人大器成功也算是成功嗎？」

格拉德威爾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希區柯克在六十歲時拍出了他的最佳影片。塞尚在五十六歲時舉辦首次個人畫展。羅伯特·弗羅斯特、華萊士·史蒂文斯、還有其他許多人，都是他們生命晚期寫出了他們的最佳作品，這並非罕見。」

他所提到的人，不論是電影導演、畫家或詩人，都是大器晚成的典例。

弗羅斯特曾在哈佛大學修讀古典文學，可上了兩年就輟學了，之後十年教過書，辦過農場。十九歲開始發表詩作，但後來大多數詩稿都被退回，默默無聞地寫了二十年，後來在英國出了兩本詩集，才有詩名響起，那時他已經快四十歲了。五十五歲之後才出版榮獲普利策詩歌獎。最後一次獲獎已是六十九歲，可見他的最佳作品大多是在年過半百之後寫出來的。

史蒂文斯的本職是律師，在康涅狄格州一家車禍與賠償保險公司任職。近四十年，還當過公司的副總經理，寫詩全靠業餘時間，出第一本詩集時已四十四歲，直至七十五歲，即去世前一年，才獲得普利策詩歌獎，死後才聲譽日隆。

保羅·奧斯特在《布魯克林的荒唐事》中列舉了世界各國許多英年早逝的作家和詩人，說明他們大器早成，英才早折。我們似乎也可以舉出許多作家和詩人在晚年寫出佳作、力作、傑作的例子。

歌德的《浮士德》殺青於他逝世前一年，即他八十二歲那年。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寫於他去世前兩年，時已五十八歲。涅克拉索夫在其生命最後十四年中寫成《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契訶夫病逝世於寫完《櫻桃園》那年。伏爾泰六十五歲時寫出《老實人又名樂觀主義》。曹雪芹晚年寫《紅樓夢》，未能完稿即離開人世。巴金晚年寫出《隨想錄》。

大器晚成者也好，晚年寫出力作者也好，都是我們的垂範者，勉勵我們努力工作，勤奮著述，雖至老耄之年，猶不哀歎，而終有大功告成，不必感歎此生虛度。

大器或可晚成

陳安



韓萌《第一次飛》 許定銘

一九四〇年代末，內地大批文人南下聚居香港，等候機會遷往歐美，或候船過南洋，或渡海峽，都是過客心態，有人軍運靈通日子，有人為謀生而埋頭伏案，認真地編寫及出版過不少文學作品。與此同時，也有些人是從海外回歸，滿腔熱誠，等候回國服務的，熱愛文學的韓萌就是。

韓萌（一九二〇至二〇〇七）原名陳君山，是出生於馬來西亞的廣東普寧人，抗戰前夕回國升學，並加入抗日行列，戰後回到馬來西亞從事教育。一九四九年抵港任了幾年，得求實龍之助，辦出版社，專門出版南洋作家的創作，後來還編過一套《南洋文藝作品選集》。

如今大家所見的《第一次飛》（香港赤道出版社，一九五〇）即是韓萌主編的《海外文藝叢刊》第一輯，是本書型的「變格期刊」。三十二開本的《第一次飛》只有六十頁，小說有韓萌的《第一次飛》、班俊的《憂鬱的行程》、蕭村的《錫蘭裡》……等五篇，還有詩、散文、翻譯、木刻等共十四篇。在《表現海外華僑生活》的代發刊詞中說，他們覺得在南洋這個商業社會裡，文藝是連咖啡、冰淇淋也比不上的，所以他們下定決心要開一塊文藝園地，供大家播種、灌溉、培植……，可惜我只見到《第一次飛》，而見不到第二次飛……文藝何時才會受到重視呢？

生活常青於坦然



還在為工作生活上的事煩惱不已，什麼上司不賞識呀，工作業績不突出啦，還有同人之間不服氣啦，還有些生活瑣事等等，前幾日登山，頗有感悟。山不是很高，但整個身體沐浴在清爽的山風中，看着飛舞的彩蝶，聽着鳥兒的鳴叫，情不自禁地深深呼吸着花香、葉香和草香，仰望天空，天青雲淡，眺望遠處星羅棋布的高樓，俯瞰山下川流不息的車流、匆忙行走的人們，心境忽然開闊了，當回首曾經走過的那些歲月，我驚然的發現，其實生活賜予我的，並沒有與別人有什麼的不同，呈現在我視野裡的生活，每個人其實都一樣，不同的僅僅是我們的胸襟中缺少一份「坦然」。

大千世界，些許煩惱事，諸多不安心！感覺：活得坦然，才能夠活得無愧！生活如歌，有鏗鏘激昂，也有低緩哀怨；有清脆嘹亮，也有苦澀沉悶。有時會是一片陽光明媚，有時也會一場淒厲的風暴。生活不會因快樂或憂傷而停留。花兒之所以美麗，是因為接受了雨露的洗禮；雄鷹能飛越高山，是因為它敢於搏擊長空。坦然面對生活，生活才會回報你……

我喜歡坦然，喜歡生活。散步，我想；朝露的滋潤，我也想；晚風的溫存，我仍想。綠色的田野，一望無邊的田園，城河的長堤，柳樹，都有年輕人的身影。年輕，真好！工作，生活的諸多煩瑣事，和這比，還煩嗎？

有疼我愛我的父母，有關心我的親朋好友，些許煩惱不足為懼。因為我還有一顆感恩的心！當然了，我也愛在疲憊時，因別人一杯熱茶的慰藉，感激涕零，嚮往美好，大度看待一切。海納百川便成汪洋之勢，把自己放在最低處，會吸納眾多精華！坦然，其實就是平淡中的一份自信！坦然是一份快樂！是一種瀟灑！

生活是美好的，之所以和別人有不同的感歎，不是因為命運和生活賜予我太多的美好，而是我不同於別人對幸福和生活的思維方式罷了……面對事物的坦然……使我感覺到了更多的美好……

生活永遠如沐陽光，擁有寬廣和博大的胸懷，坦然是一生的一個寶藏，望望頭上天外天，走走腳下一馬平川，無路難，開路更難……流星劃過，天空留下一道痕跡，學會坦然面對一切，讓生命的軌跡多一些平滑孤線……

庭前花開花落，春去春又回來。夕陽下，倦鳥歸巢。那該是多麼唯美的景致啊！生命裡許多故事，在展開來時，都可以舒眉付諸一笑，到那時，該是何等的卓然高傲。心，又該是何等的寬廣淡泊。

有人會如是對我說：世事我曾抗爭，成敗不必在我。是啊，成敗何須在我，只因我會努力抗爭過。突然覺得一陣空明。淡然的對待人生吧，所以我要以豁達的心胸去對待生活和身邊的每一個人。切莫因小事與他人斤斤計較。當人生走了一段路後，你回首時會發覺好多會發生的事都是如此的多餘和荒謬，不禁啞然。生活中那些衝着我的讚賞和嫉妒對我同等重要，足夠證明我真的不同了……嘿，那些想繼續看我的笑話的人，就請您趕快跟上……不知不覺我步伐又輕快起來了，一路輕笑……

李勇陽

范長江的一篇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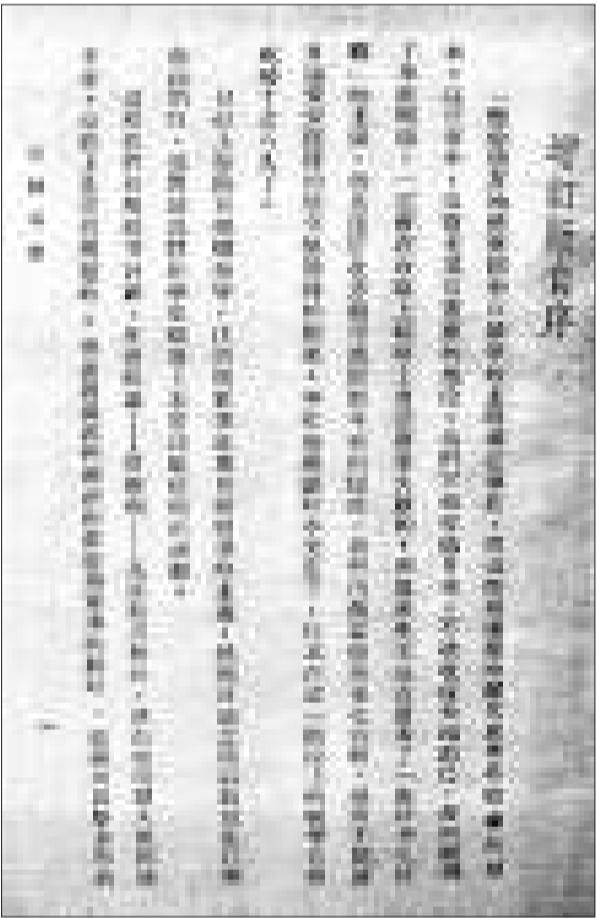
王鵬



最近，我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翻閱民國時期書籍，發現一本范長江編輯的《西線風雲》（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大公報》初版），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再次翻閱中文圖書目錄卡片，又發現范長江編輯的增訂版《西線風雲》（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漢口出版）。我把它們借出後詳細翻閱，終於發現在後一版書前，除原有的王芸生「序言」（即「王序」）外，又增加了一篇范長江自己撰寫的「增訂版自序」。此外，在增訂版《西線風雲》的篇目中，較之初版，除增加一些戰地通訊之外，還增加兩位中共領導人的文章——周恩來的《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和林彪的《抗日戰爭的經驗》，這是當時

國統區出版物中不多見的中共領導人的文章。我曾閱讀過不少范長江著作和研究論文，這篇「增訂版自序」從未見有人提及；據范長江之子范蘇蘇講，他也不知此文。毋庸置疑，這本一九三八年版《西線風雲》已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多年，而它的發現，對研究抗戰初期晉察綏戰場在抗戰中的地位以及戰地記者群的採訪目的和採訪重點，大有裨益。

范長江（一九〇九——一九七〇年）是中國現代新聞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通訊集《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聞名於世；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目前以他和鄒韜奮名字命名的「長江鄒奮獎」，已評選到第九屆，這是中國內地新聞的最高獎項。范長江的這篇「增訂版自序」，在其早期新聞生涯中，應該佔有重要地位，同時也是對晉察綏戰地採訪的一個精煉的總結。但在我的印象裡，已往編輯和出版的范長江文集，始終未能收錄其間。為了印證我的看法，我翻閱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陸續出版的有關資料，如范長江著《通訊與論文》（一九八一年四月由新華出版社出版）、沈譜（即范長江夫人）編《范長江新聞文集（上、下卷）》（一九八九年九月由中國新聞出版社出版）、沈譜新編《范長江新聞文集（上、下卷）》（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由新華出版社出版）、范蘇蘇與王龍合編《范長江與青記》（二〇〇八年三月由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出版），均未收錄這篇「增訂版自序」。另外，在方蒙著《范長江傳》（一九八九年二月由中國新聞出版社出版）、徐向明著《范長江傳》（二〇〇二年五月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不盡長江滾滾來——范長江紀念文集》（二〇〇四年九月由群言出版社出版）、林溪聲著《范長江：記者，永遠「在路上」》（二〇〇七年六月由香港《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范長江新聞思想和實踐討論會專輯》（四川省新聞學會會刊第四期）以及眾多研究范長江論文中，也都未提到這篇「增訂版自序」。近日，我詢問過范長江之子范蘇蘇，向他請教是否見過這篇「增訂版自序」，他說：「我沒見過這篇『增訂版自序』，這是一個重要的、驚人的發現，填補了范長江文集的空白。明年三月三十日是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七十周年紀念日，屆時要再版《范長江與青記》，一定把這篇『增訂版自序』編入其中。」



新發現的范長江佚文

《西線風雲》初版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大公報》出版，當時抗戰已全面爆發，儘管處於戰時，兵荒馬亂，但書中所記述的記者筆下的抗日激情和頑強反擊的精神，使讀者為之感動，該書發行量上升，銷售門市告罄。為了滿足讀者的一時之需，加之初版倉促，有許多戰地記者的通訊未能及時收錄，因此范長江不得不考慮增訂再版的問題。他在繁忙的採訪工作之餘，繼續搜集戰地通訊，故而，吃刀削麵須用大瓦碗方才相配，若是用金屬碗，呈現的是一種後工業時代的口感，也就不再具有淳樸自然的表現力了。這正如喝葡萄酒須用玻璃杯，喝清酒就得用瓷杯，道理是一樣的。

有食客前來，在小凳上坐定，老闆招呼一聲，取一個粗瓷大碗，往裡施放好油鹽配料。然後把一團已經事先和好的麵，放在木托板上再揉兩揉，接着就像是拉小提琴一樣，把托板架到了肩膀上，另一手用一塊特製的小刀片，往麵團上一下一下地削，手法嫺熟，輕重有致。削出來的一絲絲麵條就像是長了眼睛似的，不偏不倚地飛落到沸騰的湯鍋裡。每削幾刀，老闆就在麵團上換一個角度，使得不斷縮小的麵團總是保持着橢圓形。

看看份量差不多了，老闆放下麵團，往鍋裡添放一小把青菜，然後一手持撈勺，一手持一雙長筷子，把燙熟的麵條和青菜撈到一個粗瓷大碗中，再從另一口鍋裡舀一勺事先熬好的骨頭湯。好了嗎？！還有

並為再版準備了這篇「增訂版自序」，此文寫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間的漢口，文章不長，僅有七百一十個字。

范長江在這篇「增訂版自序」中，重點敘述他擔任《大公報》採訪課主任指揮戰地記者，如《大公報》的孟秋江、陸詒、方大會、邱溪映、徐盈等，為什麼要以晉察綏為採訪方向，他說：「一部分朋友始終堅認中日戰爭的主戰場在華北，而山西、綏遠、察哈爾又為華北戰場的根據地。……我們仍然要堅持華北抗戰，絕對不能讓日寇安穩穩地建立他幸得的戰果。華北如果讓日本安定了，日本在這一階段上的戰爭已經成功了十之八九了。」范長江以此說明華北在全國抗戰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他在書中還選錄了另一位《大公報》記者章丹楓的文章，即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上海《大公報》發表過的《西戰場之軍事地理》，用以印證他的觀點。

范長江在這篇「增訂版自序」中，還向讀者強調，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以後，上海、南京相繼失守，日軍深入江浙一帶，使之成為中日軍事爭奪的主戰場，「然而日寇之所以敢於在江浙如此猖狂，是因為我們在華北戰場上未曾採取積極地活動」，其原因是「因為我們政治的腐敗與軍事的分歧，而西線的出擊未能成功，反而給日寇把我們華北戰場的根據地佔去大半，重要據點，通通已入敵手」。范長江在此又一次強調了西線戰場（即晉察綏）在整個抗戰中的重要地位，他說：「因為西戰場是我們戰略上最機動的戰場，而敵人對付西戰場也是極富於戰略意義的作戰，所以從戰略和戰役的觀點，而戰場戰爭的經過是比任何一個戰場有變動性，有更豐富的內容。而我們在這一戰場上的政治軍事活動，比哪一個戰場都錯綜複雜，而有反映中國各方面問題的資料。……我們要翻本，必定從華北反攻開手，而爭取西戰場的優勢又是前提。我們要有力的重整旗鼓，必須軍事政治的大改造，而西戰場上各軍事政治的對比，就是很好的參考。」這其中最後兩句話，是有深刻含義的。當時的西線戰場的中國軍隊，既有國民黨中央軍、本土晉察軍，也有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既有正面戰場，也有敵後戰場，既有陣地戰，也有游擊戰和運動戰，這一抗敵局面，確實值得「很好的參考」。

對於增訂版《西線風雲》中載有二十六篇戰地通訊，范長江說：「我們幾位工作朋友，抱定真切報道的志願，分頭奔馳各戰場，但是零星發表，很難給人以系統參考的便利，我因為有一時期後方工作的餘暇，特按戰爭經過先後秩序，編為是書。本書月前在上海出版後銷行甚廣，因感一般讀者需要之迫切，乃在漢口重印，並將山西戰爭全部材料加入，欲讀者能從本書中，親切地看出戰爭之演變，和這些過程中告訴我們一些什麼東西。……本書中沒有一篇不是在死生線上換來的作品，我雖然盡了系統編列的工夫，而每一篇的精華，仍屬之於各篇的作者。」

本文所記敘的這篇被塵封近七十年的范長江《西線風雲》撰寫的「增訂版自序」，對於我們今天研究抗戰初期的軍事史和新聞史，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分析問題的思路，它無疑是一篇不可多得、具有重要價值的珍貴文獻。當然，書中的二十六篇戰地通訊同樣彌足珍貴。我真诚希望有眼光的出版者能夠重新翻印出版增訂版《西線風雲》，讓今天的讀者全面瞭解七十年前戰地記者們的風貌和他們對殘酷戰爭的紀錄，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花都大道」 姚 船



一提起「花都大道」，人們第一個反應大概是想到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吧？巴黎素有世界花都之稱，那筆直、壯觀的香榭麗舍大道，寬闊人行道上整齊排列着剪成方形的綠樹，花崗石砌的雄偉凱旋門就座落在大道上，陽光下的英麥每天吸引著萬千世人的眼光，每逢大節日，十里火樹銀花璀璨奪目，無與倫比，把這裡喻為花都大道一點也不為過。

然而在北美洲，近日有一條真正命名的「花都大道」（Hua Du Avenue）誕生了。它座落在與多倫多北面相連的萬錦市（Markham）。說起它的命名，還有一段故事。一九九八年，萬錦市長高鴻恩率該市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與鄰近廣州的花都市結為友好城市。雖然後來花都市變成了廣州花都區，但兩地關係依然，經貿文化交流不斷發展。

今年，為慶祝萬錦與花都締結友好城市十周年，萬錦市議員趙善江訪問花都後，建議把萬錦市一條新街道命名為花都大道，並按程序提交申請。經市議會審議通過及消防部門核准，一塊寫有中英文字樣「Hua Du Avenue, 花都大道」的路牌，在萬錦市長和花都政協主席以及市民的見證下，正式豎立在加拿大土地上。

萬錦是加國近年迅速崛起的城市。成片嶄新住宅區不斷湧現，城市配套逐步完善。由於交通便利，物業租金遠比多倫多平，所以不少公司都選擇在此紮營，像IBM等一批著名高科技和創新公司立足該市，把萬錦變成加國其中一個高科技發展中心。而廣州市花都區的建設發展也令人刮目，新白雲機場、珠寶商貿、皮具生產和汽車城等四大產業，已成了該地特色。

萬錦也是華人喜歡居住的城市之一，有些社區，華裔人口佔半數以上，加之其他少數族裔，使該市多元文化色彩濃郁。華人說起西人市長的中文名字都十分順溜。而該市也重視與中國有關方面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今年四月，市長薛家平曾率團到中國訪問。他在命名儀式上，除了讚賞花都經濟繁榮，令人印象深刻外，強調「花都大道」彰顯兩地人民情誼，期望加中兩國友好關係繼續不斷發展。

雖然花都大道建設工程要明年春天才正式全面鋪開，但幾年後，一條有一公里長、東西走向的嶄新大道就會呈現在各族裔市民面前，迎朝陽，送晚霞，見證萬錦和花都兩地人民與日俱增的友好往來。

刀削麵



所居的小區旁邊有個小吃夜市，頗為方便我這種作息時間不正常的人，有時寫作看書到半夜，肚子餓了，又不願意自己動手做，出門走幾百米就能品嚐到各種各樣的小食。吃飽後，從夜靜無人的街上慢慢踱回來，集散步、消化於一體，有一種村居的閒逸。

我最常光顧的是一家刀削麵攤。在夜市的輝煌燈火下，與炒米粉、燒烤等動靜很大的攤檔相比，這家刀削麵攤很不起眼，兩三張簡易小桌，一張一平米大小的枱面，擺滿了油鹽醬醋之類的調料，只有一摞粗瓷大碗稍稍顯示出了與眾不同。刀削麵乃山西著名小吃，也是一種極具地方特色的麵食，粗獷、豪放都是其中的組成元素，想像力豐富的，甚至還可以由刀削麵聯想到迂迴曲折的黃河，逶迤的丘原土牆，以及黃土地上的那些頭戴白羊肚頭巾、古銅色肌膚的人……

故而，吃刀削麵須用大瓦碗方才相配，若是用金屬碗，呈現的是一種後工業時代的口感，也就不再具有淳樸自然的表現力了。這正如喝葡萄酒須用玻璃杯，喝清酒就得用瓷杯，道理是一樣的。

有食客前來，在小凳上坐定，老闆招呼一聲，取一個粗瓷大碗，往裡施放好油鹽配料。然後把一團已經事先和好的麵，放在木托板上再揉兩揉，接着就像是拉小提琴一樣，把托板架到了肩膀上，另一手用一塊特製的小刀片，往麵團上一下一下地削，手法嫺熟，輕重有致。削出來的一絲絲麵條就像是長了眼睛似的，不偏不倚地飛落到沸騰的湯鍋裡。每削幾刀，老闆就在麵團上換一個角度，使得不斷縮小的麵團總是保持着橢圓形。

看看份量差不多了，老闆放下麵團，往鍋裡添放一小把青菜，然後一手持撈勺，一手持一雙長筷子，把燙熟的麵條和青菜撈到一個粗瓷大碗中，再從另一口鍋裡舀一勺事先熬好的骨頭湯。好了嗎？！還有

頭呢。澆頭通常是用瘦肉切絲，略勾些芡，然後佐以木耳、黃花菜一同煮成，肉滑汁濃，用以配刀削麵，味道極佳。老闆把麵端上桌前，辣椒和醋就由客人自己添加了。順着鼻嗅升騰的熱氣，勳動兩下鼻翼，熱香撲鼻，仔細端詳，只見一根根象牙色的麵條勻稱齊整，厚薄一致，在嫩綠的青菜映襯下，一如翡翠白玉，煞是好看。用筷子挑幾根麵條送入口中，一股濃郁的麥香頓然在口腔中灑開來，麵條筋而不韌，加上清而味濃的湯水，一切都搭配得恰好處。

不過，南方以麵食作為宵夜的人還不是很多，刀削麵攤也略顯安靜，只是偶爾會有一些正在熱戀的男女光顧。麵端上來之後，你往我的碗裡夾幾根麵條，我往你的碗裡夾幾片肉，你儂我儂，以刀削麵交換着彼此的愛意。這溫馨一幕，有着幾許出世的古典氣質，時常會令我莫名地想到男耕女織的農耕社會。

中國地名中的「百家姓」

許揚



「馮家峪」。此外，以古代的一些設施、園林、場所命名的地名，其由來與馮氏也沒有直接聯繫，如北京郊區有許多叫「馮家峪」的地名，但姓馮的很少，甚至沒有，其得名源頭叫「馮家峪」的地名，但姓馮的不少叫「黃莊」的地名，也不是因為這些地方是養馬的地方，原來這些地方為皇家所有的田莊，日久天長，人們叫「皇莊」諧音成了「黃莊」，而一些叫「羊坊」的地名，多為古代養殖羊或買賣羊的場所，與百家姓中的「羊」也沒多大關係。

同音，但其由來與馮氏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如北京密雲縣的「馮家峪」，並沒有姓「馮」的。傳說當年穆桂英與遼兵大戰時，在這裡被擄破盔甲，遼兵敗退後，她坐在村邊縫補盔甲，為紀念她，便把縫甲的地方叫成了「縫甲峪」，時間一長就叫成了「馮家峪」。

也有姓馮的地名。《百家姓》中的姓氏同音，但其由來與馮氏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如北京密雲縣的「馮家峪」，並沒有姓「馮」的。傳說當年穆桂英與遼兵大戰時，在這裡被擄破盔甲，遼兵敗退後，她坐在村邊縫補盔甲，為紀念她，便把縫甲的地方叫成了「縫甲峪」，時間一長就叫成了「馮家峪」。

同音，但其由來與馮氏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如北京密雲縣的「馮家峪」，並沒有姓「馮」的。傳說當年穆桂英與遼兵大戰時，在這裡被擄破盔甲，遼兵敗退後，她坐在村邊縫補盔甲，為紀念她，便把縫甲的地方叫成了「縫甲峪」，時間一長就叫成了「馮家峪」。

中國許多地名是以姓氏命名的，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以姓氏命名的地名不下千個。而北宋年間編的《百家姓》所收錄的姓氏中，僅在北京地名中就有二百多個，既有單姓，也有複姓。只要不是特別生僻的姓氏，在北京幾乎都能找到相應的地名。

北京地區的地名歷史悠久，許多地名都有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特別是明朝初期，各地大量的移民湧入北京，使居民數量急劇增加，出現了許多新的街巷、村落，於是來一些新的地名相繼誕生。歸結起來，這些以姓氏命名的地名由來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城區的地名多被稱為「×家胡同」，如方家胡同、夏家胡同、史家胡同等，「×家巷」，如周家巷，「×家街」，如祖家街等。而郊區的地名多被稱為「×村」或「×家莊」，如李村、魏家莊，「×莊」或「×家營」，如霍營、屠家營。

二是相當數量的姓氏地名是以某一姓氏的人家居多而得名。也有的是以最初在此定居的人的姓氏命名。如：三是一個姓氏多個地名，多是張、王、李、趙、劉、楊等大姓。

四是有一些景物命名，城區多以橋（×家橋）或在石橋旁，便將地名命名為「李家橋」，而劉姓人居住的大院，便稱之為「劉家大院」。郊區的多以某一姓氏的墓地或臨近的山、水為地名。

不僅北京地名喜歡和姓氏扯上關係，外地許多地方也是如此。譬如南京與姓氏有關的地名甚多，有趙家莊（六合區）、孫家窪（浦口區）、李府巷（秦淮區）、周家山（棲霞區）、吳家巷（浦口區）、鄭家莊（建邺區）、王府巷（秦淮區）、馮家溝（六合區）、陳家牌坊（秦淮區）、諸莊（棲霞區）、衛崗（玄武區）、蔣公廟（棲霞區）、沈家莊（建邺區）、韓家苑（建邺區）、楊公井（白下區）等。

而姓氏應用最廣最複雜有趣的則是重慶城。有汪山、李家沱、董家溪、楊家坪、馬家堡、肖家灣、陳家壩、劉家台、王家坡……有的地名並無姓氏，但地名的背後，是有鼻子有眼睛的重慶地名。

也有姓馮的地名。《百家姓》中的姓氏同音，但其由來與馮氏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如北京密雲縣的「馮家峪」，並沒有姓「馮」的。傳說當年穆桂英與遼兵大戰時，在這裡被擄破盔甲，遼兵敗退後，她坐在村邊縫補盔甲，為紀念她，便把縫甲的地方叫成了「縫甲峪」，時間一長就叫成了「馮家峪」。

中國許多地名是以姓氏命名的，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以姓氏命名的地名不下千個。而北宋年間編的《百家姓》所收錄的姓氏中，僅在北京地名中就有二百多個，既有單姓，也有複姓。只要不是特別生僻的姓氏，在北京幾乎都能找到相應的地名。

北京地區的地名歷史悠久，許多地名都有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特別是明朝初期，各地大量的移民湧入北京，使居民數量急劇增加，出現了許多新的街巷、村落，於是來一些新的地名相繼誕生。歸結起來，這些以姓氏命名的地名由來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城區的地名多被稱為「×家胡同」，如方家胡同、夏家胡同、史家胡同等，「×家巷」，如周家巷，「×家街」，如祖家街等。而郊區的地名多被稱為「×村」或「×家莊」，如李村、魏家莊，「×莊」或「×家營」，如霍營、屠家營。

二是相當數量的姓氏地名是以某一姓氏的人家居多而得名。也有的是以最初在此定居的人的姓氏命名。如：三是一個姓氏多個地名，多是張、王、李、趙、劉、楊等大姓。

四是有一些景物命名，城區多以橋（×家橋）或在石橋旁，便將地名命名為「李家橋」，而劉姓人居住的大院，便稱之為「劉家大院」。郊區的多以某一姓氏的墓地或臨近的山、水為地名。

不僅北京地名喜歡和姓氏扯上關係，外地許多地方也是如此。譬如南京與姓氏有關的地名甚多，有趙家莊（六合區）、孫家窪（浦口區）、李府巷（秦淮區）、周家山（棲霞區）、吳家巷（浦口區）、鄭家莊（建邺區）、王府巷（秦淮區）、馮家溝（六合區）、陳家牌坊（秦淮區）、諸莊（棲霞區）、衛崗（玄武區）、蔣公廟（棲霞區）、沈家莊（建邺區）、韓家苑（建邺區）、楊公井（白下區）等。

而姓氏應用最廣最複雜有趣的則是重慶城。有汪山、李家沱、董家溪、楊家坪、馬家堡、肖家灣、陳家壩、劉家台、王家坡……有的地名並無姓氏，但地名的背後，是有鼻子有眼睛的重慶地名。

也有姓馮的地名。《百家姓》中的姓氏同音，但其由來與馮氏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如北京密雲縣的「馮家峪」，並沒有姓「馮」的。傳說當年穆桂英與遼兵大戰時，在這裡被擄破盔甲，遼兵敗退後，她坐在村邊縫補盔甲，為紀念她，便把縫甲的地方叫成了「縫甲峪」，時間一長就叫成了「馮家峪」。